

# 社会结构对西北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

——基于陕西省农业地区的调查研究

张红, 姚自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目的] 探讨西北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现代农业的总体面貌, 揭示该区当代农业发展缓慢产生的社会根源。[方法] 以陕西省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 结合陕西省特有的生态资源禀赋与社会文化禀赋, 探讨现代农业与社会发展间的关联性与发展趋势。从社会结构入手, 分析了人口外流、阶层分化等社会因素对于现代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结果] 从发展理念、社会基础和均衡性三个方面分析, 认为研究区农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该区社会结构的“断裂”、“失衡”与“差距”。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不仅受严酷的自然因素和低水平经济因素的影响, 而且深嵌于社会结构中, 受到社会组织、社会政策、行政干预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 即变迁中的农业面貌因外部变量的影响而被改造。[结论] 对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 实质上就是对农村社会形态的选择, 与区域未来的发展走向关系密切。

**关键词:** 农业问题; 社会结构; 西北欠发达地区; 发展对策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8X(2017)01-0255-07

**中图分类号:** F32, C91

**文献参数:** 张红, 姚自立. 社会结构对西北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J]. 水土保持通报, 2017, 37(1): 255-261. DOI: 10.13961/j.cnki.stbctb.2017.01.045; Zhang Hong, Yao Zili. Impa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 structure on agricultural evolution of undeveloped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7, 37(1): 255-261. DOI: 10.13961/j.cnki.stbctb.2017.01.045

## Impa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 Structure on Agricultural Evolution of Undeveloped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A Case Study Based on Surveys in Shaanxi Province

ZHANG Hong, YAO Zili

(Humanity College,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overall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agriculture with regard to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were depicted to illustrate the intrinsic social reason that might potentially slow down the agricultural progress. [Method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especially on the topics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sociocultural connotation were conducted in Shaanxi Province of Northwest China. The province was exemplified to analyze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contemporary agriculture progress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to predict the agricultural evolution tendency. From social structure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emigration and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on the agricultural evolution were discussed. [Result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concept, social foundation and equilibrium, a list of problems existed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re thought rooted in social structure as the phenomena of breakout, imparity and gap.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ndeveloped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were both affected by the rigorous environment and low level economy. Besides, it was also mutually affected by social structure factors as organization form, policy and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In other words, the agricultural progress itself was routinely shaped by external factors. [Conclusion] Choosing the operation mode for modern agriculture is essentially choosing the social formation for rural area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rend.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blem; social structure; undeveloped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developing countermeasures

收稿日期: 2016-10-20

修回日期: 2016-11-26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10BSH017); 陕西省软科学项目“旱区农业的社会结构研究”(2016KRM067)

第一作者: 张红(1968—), 女(汉族), 安徽省庐江市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教学和研究。E-mail: zhaojun629@vip.sina.com。

进入 21 世纪,我国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国家对农业生产、农村环境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断增加。然而我国落后地区多数村庄的农业及其经济却发展缓慢,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危机。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学界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结构分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sup>[1-3]</sup>,但并没有把二者联系起来做整体上的综合考察<sup>[4-6]</sup>。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成果缺少体现西北区域特色的理论解释和发展型的政策研究。较大范围的调查统计数据,缺乏从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社会因素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难以揭示农业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sup>[7]</sup>。

已有研究在有关农业发展的研究视域上存在一些局限。(1)大多从自然科学、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述怎样改造传统农业,或是强调农业作为产业的经济价值,忽视了社会研究的意义<sup>[8]</sup>。(2)静态的结果性研究没有把农业所处的社会结构看成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研究结论上不仅没有深入全面地剖析农业如何从“增长”转向“发展”,而且所得结论的实践性也不强<sup>[9]</sup>。(3)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学界关于现代农业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有待于将二者有机衔接开展从微观调查到宏观理论阐释的研究。因此,有必要从多学科视角入手,探讨社会因素如何促使农业经营体系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以便对农业转型的动力与路径形成多样的理解和阐释。

本文以陕西省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统计分析,结合陕西省特有的生态资源禀赋与社会文化禀赋,探讨现代农业与社会发展间的关联及发展趋向,并针对性地提出不仅有利于农业发展,而且有利于环境、经济、社会协调的建议。并通过探讨转型时期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下农业的总体面貌,以及解决农业发展滞后等问题的社会原因,为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社会结构的改造及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没有沿袭学界惯用的从农业内部寻找缘由的分析框架,而是沿着“农业与社会的关联—农业问题的社会根源—优化农业与社会结构对策”的逻辑思路进行分析。本文运用实地调查法,在“点”上进行微观事实经验分析。同时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近 20 a 来陕西省农林牧渔业产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城乡人口变化情况,从“面”上归纳陕西省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概况。点面结合有助于从社会结构背景中探讨农业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探明农业所受的社会制约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

## 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欠发达地区,土地面积  $2.06 \times 10^5 \text{ km}^2$ 。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和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三大气候带。按照地貌地域特征可以将该区划分为长城沿线风沙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渭北高原区、关中灌区、汉中盆地和秦巴山区六大农业经济区。陕西省农业人口 1 790.5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47.4%;农村劳动力 1 131 万人,占农业人口的 63.2%。2014 年全省生产总值 17 689.9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 1 564.9 亿元,占生产总值的 8.8%<sup>[10]</sup>,反应出该区农业经济水平极为低下。

以陕西省为代表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生态类型多样,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农业发展深受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失调的社会环境影响;该区现代农业具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水资源有限,人均耕地面积小、散、乱的格局明显;(2)水土流失与土地退化现象较为严重;(3)农业经营方式粗放,发展基础薄弱;(4)农村社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农村凋敝已成趋势。

## 2 农业发展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关系

社会结构的协调与平衡是农业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的“断裂”、“失衡”与“差距”是农业危机产生的根源(图 1)。农业发展不仅关乎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涉及如何破解农业结构化与社会应对脆弱性的命题。因此,本文在陕西省现代化进程的广阔视野中分析农业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建立符合区域农业发展事实的社会归因模式;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出发,提出优化社会结构以及对制定农业政策产生影响的对策。

### 2.1 社会结构的失衡

从文化结构看,陕西省作为我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有其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耕作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与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观念、习俗和心理取向。从人口结构看,30 a 多来该区农村大规模人口外流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种地经济效益低→进城务工→乡村空心化→务农人口老龄化→农业副业化。从阶层结构看,大量小农沉淀在金字塔底层,不能有效地实现与土地的分割,规模化生产难以形成,中农阶层难以孕育。从就业结构看,陕西省的农业人口占比依然偏大;第二产业以工矿业为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较强;第三产业方兴未艾,但带动力不强。

### 2.2 社会结构的断裂

21 世纪陕西省大部分农村所处的社会结构明显

已经满足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1) 转型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存,“各自为政”地处于几个不同的时代,相互之间缺乏“能量交换”与有机联系<sup>[11]</sup>,主导性的农业政策无法兼顾各方利益。(2) 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即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sup>[12]</sup>。发展中的断裂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紧张。(3) 定位于“生产”的农业理念,依然强调农产品的数量,不仅忽视了绿色化的生态新目标和新遵循,也造成了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农业生活价值的丧失。

### 2.3 社会结构的差距

(1)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北地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缺乏对农业的支撑和农产品的需求。(2) 各大城市集聚了辖区内绝大比例的经济容量,“城市偏好”极其明显;同时在各中小城市,又吸纳了当地经济容量的主要部分,而广大农村地区却依旧落后甚至逐渐衰落。(3) 在国际化背景下,世界农产品供求变化、能源价格波动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国内农产品价格振荡及食品安全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中西方社会的差距实质上反映了农业所处的社会结构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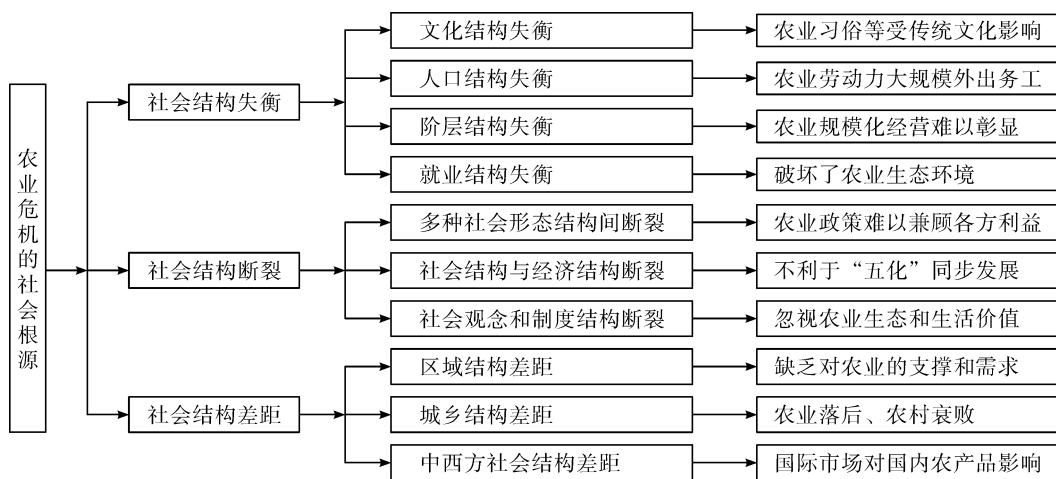


图 1 农业危机的社会根源图式

### 3 影响陕西省农业发展的社会因素调查分析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我们先后对陕西省 12 个村庄的土地、人口及现代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

问卷调查(表 1)。运用文献检索法以 5 a 为一个节点,纵向上对陕西省农业 20 a 来的变迁历程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陕西省农业发展的外显问题表现为发展理念偏颇、社会基础变化和发展不均衡,其实质根源则在于农业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失衡与失调。

表 1 研究区样本村的基本情况

调查地域	样本村名称	土地面积/ hm <sup>2</sup>	改造面积/ hm <sup>2</sup>	改造比 例/%	人口总数/ 务工人数	人均土地面 积(hm <sup>2</sup> /人)	农户数 量/户	户均土地面积 (hm <sup>2</sup> /户)
长城沿线风沙区	榆林市郝家坪村	333.33	213.33	64.0	813/379	0.41	280	1.19
	榆林市柳湾村	452.20	270.80	59.9	1 137/524	0.40	279	1.62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延安市白俭村	293.33	82.00	28.0	483/135	0.61	155	1.89
	延安市西良村	218.67	174.27	79.7	339/106	0.65	136	1.61
渭北高原区	咸阳市张家村	54.00	33.00	61.1	484/172	0.11	83	0.65
	咸阳市兴庄村	133.33	73.60	55.2	1 725/643	0.08	420	0.32
关中灌区	杨陵区斜上村	77.20	71.40	92.4	1 152/465	0.07	320	0.24
	宝鸡市虢王村	192.93	180.00	90.0	3 623/992	0.05	890	0.20
汉中盆地	汉中市青牛村	62.00	24.00	38.7	812/367	0.07	286	0.22
	汉中市古水村	162.80	73.00	44.8	2 014/898	0.08	621	0.26
秦巴山区	商洛市太子坪村	140.53	68.07	48.4	1 475/657	0.09	275	0.51
	商洛市赤地村	231.33	173.33	74.9	1 826/716	0.13	515	0.45

调查发现,研究区的农业发展多受制于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结构、半工半耕的小农经营模式以及未充分分化的社会结构,在总体上维持着传统农业“质”的稳定,发展缓慢且主要为小农经济。该区农业的发展沿着:“家庭→村庄→区域→空间”的轨迹演进,且农业越来越强烈地受到农业之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不仅受到严酷的自然因素和低水平的经济因素影响,而且深嵌于社会结构中,受到社会组织、社会政策、行政干预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即变迁中的农业面貌因外部变量的影响而被改造。具体来讲,农村青壮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中产阶级的壮大崛起,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背景,都促使农业的运行机制、组织管理、产业结构、家庭经营等方面发生了巨变。变化一旦发生,农业变革的社会经济效应将随之显现。

### 3.1 农业发展理念偏颇

农业发展理念偏颇易导致农业定位不准,而不遗余力地追逐产量上的经济效益,带来的则是生态恶化与生活乏味。目前,学界与政界对于农业的关注重点多放在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但却很少探究农业发展深层次的经营理念问题。经营理念是一项产业高度浓缩的精神所在,一旦失去精神则产业很难获得持续性的品质发展。我们认为,农业发展的经营理念不是靠外源注入,而是具备内生性的因素与持久性的特征,如区域性、继承性、优质性、合理性。区域性揭示了生态环境的独特性所孕育出的特色农业及与之配套的耕作制度;继承性强调了文化结构中的观念习俗与农耕技术的历史延续;优质性表达了一方水土养成的品种具有对消费者承诺与保证的品牌效应;合理性则暗示了农业产值与环境效益的兼顾。因此,农业发展的经营理念应指向含生产、生态、生活在内的多功能与多业态。

调查中发现,样本村以前种庄稼使用的是农家有

机肥,现在化肥的施用量的越来越大。产量虽然提高了,但对于土壤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土壤板结,以致“摩托车都能在地里开”;以前犁地靠的是人力畜力,村民干的是“手心流皮,脊背流汗”的活儿,现在实现了机械化,不犁只旋,“懒人种地,收多少算多少”;以前种地需要随时除草以避免与农作物争夺养分,现在直接喷洒除草剂大大减轻了劳动负担,但其后果却是小麦播种时的下种量由原来的 75~90 kg/hm<sup>2</sup> 涨到 112.5~135 kg/hm<sup>2</sup>;以前种庄稼轻易不喷农药,现在村中出现了喷农药专业户。据村民反映,由于害虫自身也在产生抗体,喷一种药已经不管用了。

农业发展理念应在区域生态、文化、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视域下,关注农业与环境系统(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但伴随着农业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在实现了生产力飞跃的同时,也割裂了长期延续下来的人与环境共生的历史,农业面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严峻生态现实,尤其是对于生态资源禀赋本身就极为脆弱的西北地区而言,无疑影响更加严重。

### 3.2 农业的社会基础变化

黄宗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着隐性农业革命,农业消费结构中,粮食、蔬菜、肉蛋奶比例由 8:1:1 向 4:3:3 转型<sup>[13]</sup>。通过检索陕西省 1990—2012 年间的农产品消费支出资料<sup>[14]</sup>发现(表 2),粮食在农产品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肉禽及制品、菜类等农产品消费增长迅速。另外,消费偏好的变化也冲击着传统的农业经营。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选择由价格主导转向质量主导,即,对农产品的形状色泽、水分甜度等方面提出了高要求;市场对绿色食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增加,倒逼农产品尽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市场还表现出对品牌、信誉产品的偏好,因此要求农业生产标准化及通过提高产品质量与安全创造品牌效应。消费需求变化的前提是社会结构中阶层分化的结果。

表 2 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sup>[14]</sup>

项目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粮食消费量	92.06	243.36	188.85	240.33	325.45	390.19	419.44	441.54
肉禽及制品消费量	109.15	237.38	245.58	325.32	503.12	553.01	642.23	716.92
菜类消费量	83.50	149.92	146.02	207.95	391.78	443.78	481.61	538.90

从消费供给来看,通过对陕西省近 20 a 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各项产值的分析,可以看到农业结构调整的比例变化(表 3),谷物等作物所占比例逐渐下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急速上升。表 4 显示,1999—2014 的 15 a 间,农业总产值增长将近 9 倍,“谷物类”增长 3 倍,“蔬菜、园艺作物”增长 9.6 倍,

“水果坚果茶叶香料”上升 12.5 倍,“中草药”上升 15 倍。其中,蔬菜园艺作物与水果等作物的产值已经超过谷物类作物的产值。

由此可见,陕西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的结构性转变。但当生产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时,农业经营问题浮出水面。从发展路径

看,当政府通过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等优势扶持地方产业走上正轨后,逐步退居幕后充当服务的角色,市场对生产经营的影响逐渐上升,最终决定产业能走多远的不是政府而是市场因素。但由于市场发育欠成熟及市场预测能力较差,农户在经营决策上往往容易走入“盲目跟风—产品同质—价格大跌—转行就市—产品短缺—价格上涨”的恶性循环。

表 3 陕西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各项产值<sup>[14]</sup> 亿元

年份	农林牧渔 总产值	农业 产值	林业 产值	牧业 产值	渔业 产值	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
1994	302.38	209.50	17.10	73.82	1.97	—
1999	452.47	327.65	22.29	98.98	3.55	—
2004	651.21	413.74	26.35	179.44	5.12	26.56
2009	1 337.22	823.60	45.63	387.90	6.50	73.59
2014	2 741.82	1 870.78	73.57	648.27	19.89	129.29

表 4 陕西省农业总产值及各分项产值<sup>[14]</sup> 亿元

年份	总产值	谷物类 作物产值	蔬菜、园艺 作物产值	水果、坚果、茶 叶、香料产值	中草药 产值
1994	209.50	—	—	—	—
1999	327.65	160.79	54.32	64.25	4.48
2004	413.74	221.40	90.60	85.48	16.26
2009	823.60	320.95	225.77	246.82	30.06
2014	1 870.78	479.74	519.91	803.35	67.78

从经营模式看,陕西省农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 销售作为产后环节,直接影响到整个产业链条的成果。农产品流动的辐射半径越大,说明农业经营的越好。陕西省特色农产品的销售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2) 农产品深加工不足,尤其是保鲜期短的葡萄等产品。调查中村民反映,葡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当季消费市场饱和,批发价 3 元/kg 都卖不出去。(3) 从发展空间看,农村已无可开垦的新地,无法通过扩大土地面积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农业的科技投入、种植品种已接近最优,生产要素的继续投入势必造成边际收益递减。(4) 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缓慢。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协调一致的是小土地经营,小土地的经营特征构成了以小农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小农对土地的依附与执着

又反过来对农业经营产生稳定作用。因此,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相比过去虽有所提高,但始终维持在家庭总收入的 30% 左右,农业发展呈现出“停滞”状态。

### 3.3 农业发展的不均衡性

马克思在 100 a 前曾经提出这样的论断,当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sup>[15]</sup>。转型时期陕西省农业发展的不均衡性主要源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反映出社会结构“断裂”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陕西省农业发展中涉农企业、合作组织及专业市场的出现,使得农业不再仅仅是农业社会的农业,同时也包括运输、加工、储存、保鲜、销售等环节,初步呈现产业融合发展之势。目前,陕西省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全国人均 GDP 排名中位于中游,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转变为“以工促农”。但是,陕西省农村地区就业结构中以工矿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对农业生态的破坏性较大。如何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均衡问题对于农业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其次,目前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2015 年,陕西省的城镇化比率为 53.92%,按照国家 2030 年城镇化指数达到 65% 的战略部署,意味着未来 14 a 还将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样一来,农业赢利要求规模化生产就有了可能,农业的“内卷化”可适度缓解。但这种格局出现的前提是,实现身份、职业、空间、土地“四位一体”的实质性转变。

陕西省现代农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尤其是在 21 世纪前 10 a 得到了大范围推广。表 5 的数据显示,现代农业发展是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社会背景下发生。2009 年是个拐点,城市人口超过了乡村居住人口。总体来看,人口外流对于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双重意义:2004 年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以每 5 a 约 90 万人的速度向其他行业转移。转移人口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对农产品的购买能力。

表 5 1994—2014 年陕西省人口变化情况<sup>[14]</sup>

万人

年份	城乡人口		农业非农业人口		各产业人口		
	城镇	乡村	农业	非农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4	1 668	1 813	2 720	680	1 055	333	332
1999	2 593	1 025	2 816	802	1 052	304	452
2004	1 347	2 358	2 765	916	965	361	615
2009	1 641	2 131	2 603	1 124	876	493	691
2014	1 985	1 790	2 319	1 456	782	335	528

注:由于统计制度变化,2012 年及以后第二、三产业中未含乡村就业人员。

人口流动对于现代农业发展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从 12 个样本村的调查结果来看,女性务农的比例占总人数的 75.3%,男性占 24.7%,女性比男性高出 50.6 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的性别角色由传统的“男耕女织”转变为“男工女耕”。从年龄结构看,农村中 50 岁以上的务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43.3%,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劳动力比重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出现了“父耕子工”的劳作方式。从文化结构看,84.5% 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高中或中专程度的占 10.3%,大专以上的仅占 5.2%。低下的文化水平严重阻碍了农民接受新技术与新知识以及生产经营观念的转变。从兼业情况看,离土不离乡务工者的年龄多在 40~60 岁之间,在丧失市场竞争力且能兼顾家庭的现实考量下,兼业者选择农忙务农,农闲就地打工的半工半耕模式。

本研究所调查的 12 个样本村只是中国成千上万个普通村庄中的个案,但它们面临的发展困境却如出一辙: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老龄化、兼业化;农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状态,距离发展现代农业与建设新农村的国家目标相去甚远。

## 4 促进农业发展与社会结构优化的对策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对未来农村社会形态的选择,与区域未来的发展走向关系密切。

### 4.1 实现生产—生态—生活的和谐共生,促进西北欠发达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如果将农业视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则应当促成农业、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应是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关注农业背后所蕴含的生存理念,把农业从第一产业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促使农业“去产业化”<sup>[8]</sup>,即农业必须脱离现存的产业结构,进而在农业生存理念的基础上重塑社会结构,才能改变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生存面向。

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交换的部门,农业的特性与本质决定了其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三者之间的有机协调将形成生产发展、环境美化与社会整合的均衡循环系统<sup>[1]</sup>,实现农业与人、农业与社会、农业与自然的良性发展。基于此,如何有效践行现代农业在经济、生态、生活间和谐与均衡的发展理念是首要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发展目标上,现代农业应定位于社会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通过综合性价值的实现,最终

达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即从生产的农业转向既能保护环境又能提供安全食品的生态农业;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向人与自然的共生;从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农业的演变应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变相辅而行,使农业在进入商品经济和接受了科学技术的今天变革过时的结构,转“危(险)”为“机(遇)”。在发展内涵上,旨在说明特定地域的农业改造,有待于组织管理、配套措施、服务保障等创新性制度的重构。

### 4.2 构建农业与社会结构间的关联机制,实现西北欠发达地区“五化”同步发展

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造传统农业。如何打破结构性和制度性困局造成连锁变化?关键环节在于农业生产商品化;根本途径是来自农业之外的市场经济力量和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sup>[16]</sup>。

在乡村,农业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农村空心化与人口过疏化。因此,有必要将单边的产业改造政策转向区域性、发展型的公共政策。即通过政策导向,将现代农业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建设与政治文化建设,形成工农均衡与城乡一体的分散性的空间结构,同步实现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和离土不离乡的安定就业环境。(1) 工农结合将带来多样且有机的经济形态,使得农业朝着“1+2+3”(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融合方向发展。(2) 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农业结构转型,“隐性的农业革命”将使农业在范围上拓展;城市在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使得土地的规模经营有了可能。(3) 作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与贸易合作的桥头堡,随着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改善,一个超越血缘、地缘关系的信息网络社会将得以显现,为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提供平台。(4)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构建增产增收与资源环境永续利用的长效机制。作为嵌入社会结构的农业而言,构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关联机制,既实现“五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同步发展,也促使社会结构的失衡、断裂与差距逐步缩小化与凝固化。

### 4.3 强化政府支持力度,奠定西北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目前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深入发展与土地制度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家庭经营模式将会继续维系。另外,农业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和外部效应,决定了其不只是一个提供食品的产业部门。在既定现状下如何规避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怎样完善农业基

基础设施与提高农民收入?需要来自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支持。

(1) 注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通过低息贷款、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保护性农业价格政策引导农民从事多种经营、适度规模经营和强化彼此间的合作;考虑在体制、物流与农资等方面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2) 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未来的家庭经营将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商品经济基础上进行,农业的专业化与标准化都必须依靠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来提供服务。因此,需要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构建提供各种服务的组织体系,以确保社会化大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3) 建立有利于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在充分确权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敢创新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集中。

#### 4.4 培育职业农民,优化西北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人力资本

21 世纪的中国农业处于劳动力结构变化、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时期,农民经历着从身份取向到职业取向的转变,农民的状况不再是儿子继承父亲,而是一个可以选择以及需要学习的职业<sup>[2]</sup>。

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产品市场的扩大,首先应注重培育农民的职业观念、专业素养与市场主体地位。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仅看作生产者,开始考虑产品的经营时,他们的整个世界都将为之改变。其次,农民通过民主化、现代化、社会化进程逐步转变为公民。农民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媒介是商品生产,与市场发生广泛的联系后,市场价格、城市需求、政府政策等因素都将影响他们的生活。当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令法规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实际生活时,他们的视线就不得不关注国内外重大事件与政策走向,这样就把农民的视野从一家一户、一村一舍引向更广阔的天地。职业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形塑至少在强调农业的生产价值、生态价值与生活价值的协调与均衡方面会得以体现。

当农业的性质由维持生计转向商品生产时,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将会凸显。不仅表现在同类产品生产者之间的联合,而且体现在生产与销售、生产者与社会化服务者的联合。同时,根植于乡村的合作组织还表现为另外一种价值:即重新整合原子化的村民关系和衰败的伦理文化,重构乡村社区精神和社会规则。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预示着农村社会进步与农业

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变革阶段。(1) 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得到遏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态势逐步形成。(2) 随着农业功能的不断拓展、就业岗位逐步增多,农民的职业分化必然走向现代意义的社会分层。(3) 农业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因农业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得以形成。(4) 农业变迁的历程也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换、承继、融合的发展过程。(5) 在农村,生产空间、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高度重叠。以此现实为基础,在探索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村政策的内生性发展方向和动力资源时,将促使具有高度向心力与活跃性的乡村社会复兴早日实现。

#### [参 考 文 献]

- [1] 祖田修. 农学原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2]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3]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5] 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M]. 萧正洪,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 [6] Chang Peikang.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M]. Harvard Press,1949.
- [7] 简小鹰. 论农业的社会环境[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28(5):579-582.
- [8] 朱启臻. 农业社会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9] 邓大才,徐勇. 改造传统农业:经典理论与中国经验[J]. 学术月刊,2013(3):14-25.
- [10] 陕西农业网. 陕西省农业概况[L]. [2015-04-28]. <http://www.jinnong.cn/news/2015/4/28/20154281553131061.shtml>.
- [11] 朱新卓. 素质教育步履维艰的社会结构根源[J]. 科技导报,2003(4):3-5.
- [12] 陆学艺.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为15年[N]. 学习时报,2010-09-01.
- [13] 黄宗智. 中国的隐形农业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 [14] 陕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 陕西统计年鉴[Z]. 1994—2015.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6] 许平. 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